

國際政治學的美國重心

● 王逸舟

一 「重心」現象

本世紀以來，西方國際政治學研究始終存在、發散着一個「美國重心」。美國的威爾遜理想主義造就了第一階段的「烏托邦」特徵；摩根索 (Hans J. Morgenthau)、凱南 (George F. Kennan) 和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等人的研究，奠定了其後階段西方「權力政治學」的框架，使國際政治學與外交政策結合到了前所未有的緊密程度；多伊奇 (Karl W. Deutsch)、卡普蘭 (Morton Kaplan) 和沃爾茲 (Kenneth N. Waltz) 等人的「行為科學的現實主義」研究，使國際關係的分析頭一次具有了「科學」外表；以基歐漢 (Robert O. Keohane)、納伊 (Joseph S. Nye) 等人為代表的一批美國新自由主義者的工作，使全球主義學說從羅馬俱樂部的生態分析層面推進深入到國際政治層面。毫無疑問，美國始終擁有範圍最廣大、實力最雄厚的研究機構 (包括大學、研究所和課題基金)，出版比其他國家更多的國際事務期刊雜誌。美國政治家和輿論界的國際事務興趣似乎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的同業更濃厚，而

毫無疑問，美國始終擁有範圍最廣大、實力最雄厚的研究機構，出版比其他國家更多的國際事務期刊雜誌。美國政治家和輿論界的國際事務興趣似乎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的同業更濃厚，而且，很多重要的思想和見解，總是經過「美國中心」的闡述和詮釋才能形成國際研究界公認的「一家之言」。這造就了西方國際政治學研究的「美國重心」現象。

且，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很多重要的思想和見解 (無論是否由美國人首創)，總是經過「美國中心」的闡述和詮釋才能形成國際研究界公認的「一家之言」；連「美國中心論」的許多批評者，如科克斯 (Robert W. Cox)、沃克 (R. B. J. Walker)、喬治 (Jim George)，也經常是通過美國的巨大和卓有成效的科學研究網絡和印刷傳媒網絡，才得以使自己的批判理論廣為人知。此外，在非歐美的一些發達國家 (如日本)，在許多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和地區 (如東亞和東南亞)，在非西方的廣大發展中世界，國際關係學術界對世界政治的理論認識也多受美國中心的嚴重輻射，出現了所謂「美國化」現象^①。從二戰結束至80年代初的35年間出版的、被譽為「當代經典」的22部著作中，美國作者提供了18部，超過總數的80%；美國以外的發達地區的作者貢獻了另外4部，不到總數的20%^②。

下面是筆者列出的一份「清單」，以表明在當代西方國際政治學研究裏面，哪些重大課題 (或領域) 是由美國學者開創的 (或至少是其中的主要代表、流派之一)：

學說、學派或思潮	主要代表人物	要點
理想主義	威爾遜	強調國際關係中的道義原則
新自由主義	納伊、基歐漢等	國際道義與國際制度的結合
權力政治學	尼布爾、摩根索等	實力、均勢和自助原則
外交政策學	凱南、基辛格等	以外交手段實現國家利益
地緣政治學	馬漢、斯皮克曼	政治的地理學透視
勢力均衡論	基辛格、摩根索	主要是列強間的力量平衡
國際系統論	卡普蘭、沃爾茲	用系統眼光分析國際格局
國際博弈論	先林等	對手較量時的精確算計
國際決策論	斯奈德、愛利森等	外交決策的層層解析
國際威懾論	尼採、基辛格等	武力、特別是核武器的威懾分析
相互依存論	基歐漢、納伊	國家間日益密切的聯繫與利益
新現實主義	克萊斯勒、漢斯等	現實主義與國際制度的結合
結構現實主義	沃爾茲	現實主義加結構分析
結構自由主義	迪優尼、埃肯伯瑞	自由主義加結構分析
一體化理論	米特蘭利、漢斯等	側重歐洲聯盟的實證分析
新功能主義	納伊、林德伯格等	注重一體化的衍生效果
國際制度理論	基歐漢、克萊斯勒	公共產品、國際合作與博弈論
安全共同體理論	多伊奇等	共同規範、價值與制度上的安全
國際行為科學	辛格等	國際關係的數量化解析
霸權周期理論	莫德爾斯基、吉爾平	國際政治的循環規律
霸權穩定理論	莫德爾斯基、吉爾平	霸權國的形成與作用
國際政治經濟學	吉爾平、斯蘭吉奇	政治經濟學加國際關係分析
政治制度化理論	亨廷頓	強調制度化與穩定的價值
文明衝突理論	亨廷頓	強調不同種族、文化間的對立
國際學習理論	坎特里爾等	個人、集團與政府的不同學習
世界體系理論	華倫斯坦、莫德爾斯基	近代世界現代化的歷史分析
新帝國主義理論	麥格道夫	發達資本主義的國際擴張分析
依附理論	卡多佐、多斯桑托斯等	核心、邊緣及依附關係分析
建構理論	文特等	國際政治的社會學和心理學
社會批判理論	馬爾庫塞、哈貝馬斯	當代資本主義的哲學解剖
後現代理論	德·代元、夏皮羅等	命題解構與範式重建

表中列舉的30多種學說、學派或思潮，包括了當今西方國際政治學研究的主要內容。那些基本上由非美國學者創立的學說、學派或思潮，在整個研究內容中所佔的比例很有限；而

所有帶有非美國的發達區域標識的演說、學派或思潮，在美國國際政治學界都有反映。比如，曾任美國國際政治協會會長的基歐漢教授對多邊主義的分析，就是迄今為止歐美國際政治

二戰結束，美國人具有越來越強烈的「世界意識」，形成了一種所謂「美國的世界主義」態度：凡是世界的事務，都與美國有關；凡是美國的好東西，都是世界可適用的。國際政治理論全面在美國滋生，符合了這個西方新霸主自二戰結束後的國際鬥爭的要求。

學界「多邊主義」研究的最重要文獻之一^③。美國的德·代元 (James Der Derian) 教授與澳大利亞的喬治·加拿大的沃克和科克斯等人一道，是目前整個歐美國際關係研究中「後學」陣營的幾個重要倡導者。美國一些學者對「中等強國」和「弱小國家」等專題的研究，也具有相當高的水平^④。簡言之，別的國家有的，美國基本上都有；而美國有的，別的國家不一定有。這一判斷不難從上表列舉的學說、學派或思潮中得到證實：在30多個種類裏，由美國學者首創的佔多數 (60%以上)，而美國學者與其他西方國家學者共享創先「美名」的也佔了相當一部分 (30%以上)，真正完全由非美國學者創新、然後被美國學者加以繼承發展的只佔一小部分 (不到10%)。正如史密斯 (Steve Smith) 教授指出的，美國人的「統治」主要還不在於人數、刊物、資金或影響面等「量」的指標上，它更重要的是表現為「研究範式的支配性」(paradigm dominance) 上面^⑤。

二 歷史溯源

國際政治學研究之所以在美國發旺、實與美國在二戰結束以後的經歷密切相關。美國是二戰剛結束時唯一的經濟強國，其實力幾乎可以同全世界的總和較量，一段時期內它還是唯一的核大國。在這種背景下，一般美國人具有越來越強烈的「世界意識」，而美國的政治學者對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比對美國的國會政治、對地方選舉或集團多元主義也更感興趣，形成了一種所謂「美國的世界主義」態度：凡是世界的事務，都與美國有關；凡是美國的好東西，都是世界可適用

的。當冷戰開始後，美國國際政治學的研究很快適應了美國國家「國際鬥爭的需要」。從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它的世界利益出發，美國需要學者們去消除某些人尚存的孤立主義情緒，現實地承擔起世界事務主導權的「義務」；它需要學者們研究和說明權力集中的「理性」、國際干涉的「技巧」、遏制蘇聯擴張的方法及手段。國際政治理論全面在美國滋生，符合了這個西方新霸主自二戰結束後的國際鬥爭的要求。

大體上，可以劃出美國國際政治學者在使「冷戰政治」理論化方面的三次突出「貢獻」：第一次從二戰結束到50年代中期，主要是摩根索、羅斯托 (Walt Rostow)、沃爾弗斯 (Arnold Wolfers)、凱南、早期的基辛格、奧斯古德 (Charles E. Osgood) 和邦迪 (McGeorge Bundy) 等人的作品，它們奠定了美國新的外交目標和新的國際研究的基石，或者說，廓清了政策和理論的邊沿。這一時期的美國國際政治學給整個西方國際研究學術界一種全新的氣象，一種直言不諱的「權力中心學」的研討風格，一種目標專一、方法多樣、理論與政策緊密結合、學術研究同世界進程息息相關的「美國作派」。第二波從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後期，其重點和標誌是將核時代問題的研究，尤其是核戰略的分析設計，變成美國國際政治學的中心內容。這裏有一大批國際政治學者和戰略分析家，他們的研究範圍相當廣泛：從戰後技術的革新到熱核武器的出現，從一般的勢力均衡到核武器的均衡，從威懾的政治準備到威懾的心理因素，從大規模報復理論到靈活反應學說，從核理性到核裁軍，從常規裁軍談判到削減戰略武器談判，從核門檻高下的設計到防止核擴散的一般規劃，從

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關係到兩大陣營乃至全球範圍的國際關係，等等^⑥。從這時起，美國人的研究已經開始主導整個西方國際政治學界的研究趣向、領域和方法，顯示出對「冷戰政治」的詮釋「高人一頭」的姿態。第三波大體上從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中期前後，即所謂全球化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所謂「相互依存理論」等等。它與這一時期國際形勢的特點聯繫在一起：美國設法從越南脫身；美元與黃金的匯率脫鉤，世界石油市場的混亂及各國經濟聯繫的加強；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的互動關係日益明顯和得到承認；等等。與前兩個時期略有不同，這一時期由於美國國際地位的相對下降，美國的國際學術領導地位亦有所減弱，其他一些發達國家的學者也加入到創造範式、貢獻思想、產生影響的行列中來。

就美國的特殊性而言，以權力政治學為主幹的國際關係理論之所以能充分發展，其實還有若干制度性因素配合：

第一，學界與政界的密切聯繫。像西方多數發達國家的同行一樣，美國的教學界和研究界一向強調學術的獨立性和自由；但另一方面，不少美國人，尤其是國際政治學界的許多人又十分看重「學問」與「政策」之間的聯繫，美國社會特有的政治家向學問家頻繁「垂詢」、學問家以策論聞名的氣氛，使得國際政治學研究（特別是外交學研究）與政府對外政策的制訂之間建立起了一種有力的互動關係。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教授認為，在美國，國際研究領域的學者參政表現為兩個階段：頭一階段是40年代後期至整個50年代。那時，學者參政議政還是老式風格，「即文官、商人和律師的

結合。他們不得不處理整個世界的問題，不得不對付一個持久的敵人，不得不應對核時代的混亂。他們既需要數據，又需要觀點，於是他們轉向大學和學術界求教。學院派研究家這時還只是顧問和諮詢的角色（不論官方的或非官方的），他們研究的資助多半來自於主要的政府相關部門（比如國防部的資助就明顯多於國務院）。另一階段始於1960年，「這是一個轉折點」：「大學和研究院成了『總督府』，這裏聚集了各式上層人物。學者們爭相獻計獻策，證明自己的理論和辦法比他人的更適用需求、更高明有效。如果你對『政策科學家』有疑問的話，那只能是由於科學決策人的行為所致。在當時的氣氛下，學者同華盛頓的聯繫從一種知識的交換轉變成一種職業的方式。」^⑦在美國，學者參政議政，或者反過來，政府官員從學從研，在一般人看來是一種相當普遍、也相當自然的事情。美國國際政治學界的許多著名專家或多或少都擔任過政府的各種顧問甚至直接擔任過政府的高級職務，而一些著名大學的一流國際問題中心或研究所也經常由有高層決策背景的專家學者主持。這與美國中央行政體系「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特點不無關係。總統在任命新一屆政府官員（包括駐外大使）時自由度相當高。美國成了對學者尤其是國際政治學者來說有最多渠道和特殊價值的國家。

其次，基金會亦扮演著特殊的角色。與多數西方國家不同，美國各種基金會不僅數量多、實力雄厚、涉及面廣，它們的存在方式亦有助於國際問題研究，即像是權力結構與學術圈之間的某種「黏連劑」和「催化劑」。例如，許多重要的學術沙龍是由它們發起的，許多雙邊的（國家之間的）重

霍夫曼認為，在美國，國際研究領域的學者參政表現為兩個階段：頭一階段是40年代後期至整個50年代。那時，學者參政議政還是老式風格，「即文官、商人和律師的結合」。另一階段始於1960年，在當時的氣氛下，學者同華盛頓的聯繫從一種知識的交換轉變成一種職業的方式。

美國各種基金會多選用有豐富閱歷和從政經驗的前政府高官出任主持人或重要項目的負責人，他們與政府和學者間均保持着良好而密切的個人接觸，其課題資助和會議贊助方式十分方便和有利於學者們的工作。基金會發揮了權力結構與學術圈之間的某種「黏連劑」和「催化劑」的功能。

要活動是由它們安排的，許多過於敏感的話題到它們那裏有了合適的交談場所。例如，由洛克菲勒基金會推動建立的美日歐「三方委員會」在推進歐美日現任和前政府高層的非正式會晤方面，卡特林在促進中美兩國軍事交流和打破「六四」風波以後雙方外交僵局等方面，福特基金會在促進中美文化和思想交流方面，就起着有效作用。這些基金會多選用有豐富閱歷和從政經驗的前政府高官出任主持人或重要項目的負責人，他們與政府和學者間均保持着良好而密切的個人接觸，其課題資助和會議贊助方式十分方便和有利於學者們的工作（例如在對外交流方面）。大半個世紀以來，作為美國機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各種基金會，在推動建立美國國際政治學界的國際化和爭取主導地位方面有着一種不可低估的作用，它是其他國家（包括西方發達國家）所無法比擬的。

再次，美國大學本身的結構也有助於國際問題研究的推廣普及。美國的大學有兩個優點：首先，各方面十分靈活。像有的專家指出，美國的大學競爭性極強，其多樣性保證了良好的競爭和專業水準；它們完全獨立自主，既不受公眾約束，財政方面自給自足，又不像歐洲一些大學那樣墨守成規。另一個特點是，美國的大學體系有實力強大的配置：有幾十種專門的國際事務雜誌，有幾十個國際政治方面的院所和系室，有數百個國際關係講座教授，它們保證了國際關係學科的發達。美國的大學始終是國際政治研究的基地，它的教學和研究過程實際上已融為一體。在美國一流的大學，教授不僅要教書，而且也必須要有相應的研究成果，否則他很難在激烈的位置競爭中保留一席之地。就國際關係領域

而言，美國的教授對他所講授的專業通常都有自己的研究心得和專業著述，而在美國最好的大學裏講授國際政治學的教授，往往是某一學派的奠基人^⑥。

再一個特點表現在人力資源方面。眾所周知，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是當今世界人才流動的最大集聚點，這也是造就「美國中心」的關鍵因素之一。移民在美國當代自然科學、工程技術領域和社會科學界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說，美國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世界各國優秀人才及其技能或思想的吸收之上，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國家擁有這種優勢。在社會科學領域，美國的外來人才把他們的原有思想與美國的情況結合起來，所提供的不止是額外的技巧，而是全新的知識框架；他們的哲學訓練和個人經歷使他們能夠提出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很難提出的問題。在美國的國際政治學界，除了摩根索這位德國後裔外，還有許多已成為學術大家和外交智囊的著名人士，比如有沃爾弗斯（原籍瑞士）、赫茲（John Herz，原籍德國）、米特蘭利（David Mitrany，原籍羅馬尼亞）、基辛格（原籍德國）、哈斯（Ernst Haas，原籍德國）、霍夫曼（原籍奧地利）、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原籍波蘭）、李斯卡（George Liska，原籍捷克斯洛伐克）、多伊奇（原籍捷克斯洛伐克）和諾爾（Klaus Knorr，原籍德國）等人。他們多半是現實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儘管屬於不同階段、不同流派的代表）。

與許多發達國家的學者相比，美國人更重視「精密科學」的作用。這裏的「科學」含義，其一是有規律可循，其二是不斷發展進步。在研究探索過程中，美國人似乎特別相信，世間的任何問題都是可能解決的，關鍵在於

有科學的方法，即不做價值判斷的、結合了經驗調查結果的、有各種命題和公理及其測試方式的途徑^⑨。如分析家看到的那樣，新大陸的美國人為自己年輕國家的迅速成長經歷所激勵，他們希望如征服自然界一樣征服社會問題，他們相信在每一個具體的領域和問題上都會找到(或者可能找到)關鍵的答案和手段——不只是知識上的答案，也有可操作的範圍。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構成了美國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從國際政治學研究的角度觀察，它帶來了求真務實的態度和時常咄咄逼人的氣勢。

三 「新資本主義」

要理解美國人在西方國際政治學裏的中心地位，我們還必須研討美國國家／社會獨有的結構。總的來講，美國學者所以能夠在西方國際政治學界始終領風氣之先，或者更廣義地講，美國人所以能夠成為各種現代學術研究門類的「前沿陣地」，是與這個國家自身的結構分不開的。本節主要談國際政治學之「美國中心」的制度背景及其力量來源，即所謂「美國式新資本主義」^⑩。

在美國的世界霸權後面，存在着國家權力、公民社會與世界秩序三者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言，它需要在大規模生產性經濟與工會及工人之間建立一種相對「和諧的」權力／社會關係；從國家機器方面講，這種新霸權需要越來越精細有效的、適合所有權與管理權適當分離的管理方式(包括它的不斷改良)，以便使穩定的經濟增長補充、「滋潤」和扶持新的「生產型政治」，以保證大規模生產所需的利潤以及社會的穩定；

從國際層面看，新自由主義的霸權還需要不斷增強世界經濟的開放性，與此同時保持國內經濟的創新性和開放性。這三方面互相聯繫、不可或缺，歷史上它們各有自己的存在方式和淵源，但作為一個整體卻是第一次組合。美國的世界影響之所以可能，乃是由於這種新自由主義之歷史合成的實現；它在穩定的經濟增長的基礎上達成了一種新的社會認同，使國家／社會關係經歷了複雜的重塑過程。

對此，有幾點值得進一步討論：

(1) 美國特色的自由主義

與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美國沒有封建主義的歷史經歷；尤其與歐洲不同，它不是在反對貴族封建特權及壓迫的鬥爭中形成的革命意識形態。美國的自由主義本身就是一種傳統，甚至可以說，它已經成為一種「保守主義」。在這裏，自由主義是一種不爭的前提，是「政治正確」的基本內涵之一，它不像歐洲多數國家那樣是由長期鬥爭(包括和平的和流血的鬥爭)爭取來的。與一些歐洲國家(如德國)不同，即便在大蕭條年代，美國式自由主義也沒有受到撼動；政治共同體的根本法則、私人財產的特權以及公共權威的特定範圍等問題，從來沒有像歐洲一些國家那樣受到質疑，它們是從不引起紛爭的「美國遺產」。

在古典資本主義構造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自由主義體制同時擴張，各自體現不同的政治邏輯：一個強調經濟特權，其基礎是財產權；另一個強調自由和民主的優先性，其基礎是個人權利的行使。兩者之間經常發生衝突。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常常出現的政治鬥爭，反映出傳統的自由民

在美國的世界霸權後面，存在着國家權力、公民社會與世界秩序三者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這三方面互相聯繫、不可或缺，歷史上它們各有自己的存在方式和淵源，但作為一個整體卻是第一次組合。美國的世界影響之所以可能，乃是由於這種新自由主義之歷史合成的實現。

在古典資本主義構造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自由主義體制同時擴張，各自體現不同的政治邏輯，兩者之間經常發生衝突。而在美國，上述兩個方面卻在趨同，也可以說並行不悖地發展；國家／社會的關係表現為一種新自由主義的形態，一種比歐洲古典形態更複雜的形態。公共權力與私人權力有明確的定位和分工。

主制度下面「國家與社會之間」、「民主與資本主義之間」的歷史性矛盾，它們似乎代表着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存在着一种本質上難以調和的對抗。而在美國，上述兩個方面卻在趨同，也可以說並行不悖地發展；國家／社會的關係表現為一種新自由主義的形態，一種比歐洲古典形態更複雜（或許可以說「更高級」）的形態。公共權力與私人權力有明確的定位和分工。戰後以來，美國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觀念，通過公共與私人權力之間的重新談判，通過此前在大蕭條年代、「新政」和二戰時期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重新塑造，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在經濟政策方面，美國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提供的福利少，而對生產活動的刺激則較強；經濟對科技保證着較高的需求，科技進步始終排在政府和國防部門的議事日程靠前的位置上，從而使美國人的科學發明一直執世界牛耳。國家既保障勞動者和工會的活動權利與討價還價能力，又盡力使其不致破壞現有的規則和體制^①。

(2) 政治與生產方式分離下的階級鬥爭形態

美國生產方式和社會關係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從十九世紀的美國起，工業化、都市化和階級形態便表現為一種特殊的模式：「就業和工作的政治」與「國家和社會的政治」被人們給予不同的關注，由不同的社會組織加以表達，並且具有不同的動力與意願。在早期工業化時期，美國便建立起一種特殊的自由主義式的國家／社會形態，它明確地把政治實踐從工作場所排除，把勞動階層的需要與政治隔離，始終保持了公共事務與私人事務

二元化的狀況。在美國，大規模生產中的普通勞動者是與政治分離的，其主力軍（白人男性工作者）在工業化成長最快的時期通過與制度合作的投票方式而不是群眾政治運動方式表達其意願。而且，這一過程發生在高度分散化的國家機構的背景之下。在美國很難找出單一有效的政府部門機構，用以表達工人政治運動的意願。在美國，國家政治只不過是各種地方性政黨和都市機器的集合，它們動員和組織不同種族族群的、不同居民和社區的民眾，從事族際性的或社區性的參與認同過程或爭取權利的鬥爭，但缺少明確的階級意識和有組織的政治鬥爭。美國的激進左派力量從來沒有形成歐洲那樣的廣泛力量和影響。在工作場所，熟練勞動者的集中化，加上性別特點和美國的人際關係特徵，使他們更多地、也更願意集中關注他們的工作條件問題，集體與僱主談判待遇問題。與歐洲和其他地方的工會不大一樣，它們通常只代表和反映本行業、本專業的具體問題，不涉及也不支持以階級關係為基礎的政治行為。美國的工會除了排他性和保守性之外，還因為其種族、宗教、性別等因素而相對分散化。這種情況更使階級性的活動、組織與鬥爭不易發生。歷史上，像夏福特（Martin Shefter）看到的那樣：「工會和政治機器的制度同化過程，使得美國發生的任何階級衝突都不致於造成大的問題，並且始終處於受遏制的狀態。」^②

(3) 從「生產性政治」到新自由主義霸權

美國全球力量產生的歷史過程具有特殊含義。「美國特有的國家／社會關係，產生於勞動者、資本家和國家

四 前景展望

管理者之間政治鬥爭的閉鎖性終結狀態。假如沒有大規模生產的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和它賴以存在的新自由主義國家／社會複合體，美國在全球分工中的核心位置是不可能獲得的。」^⑩美國私人大資本的力量有效地推動了生產的社會組織的合作，大規模生產的制度化最終在美國式管理下發展起來。它使美國各種大規模產業中的工人，同新的、複雜的和高度相互依存的分工中的需要保持了基本一致。在美國的生產過程變得日益社會化的同時，它始終被置於一種非政治化的、以各種「經濟的」要求(如資產所有者的利潤要求和勞動者的工資要求)表現出來的形態上。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生產性政治」，創造了管理階層對生產過程的有效控制，和勞動者對私人權力下的這種管理方式的不自覺認同。制度化的機構允許甚至鼓勵不同集團、不同社區、不同種族或不同性別基礎上的討價還價，允許分配上的某些鬥爭和磨擦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也存在某種「階級鬥爭」，但它剔除了一般人理解的「階級鬥爭」概念中的政治內容。上述事實既有「工具性意義」，更有「實質性意義」。從前一方面講，正是美國大規模生產的產業，擊敗了法西斯主義，解除了戰後歐洲經濟危機，令美國始終充當着世界經濟的「領頭羊」，並在經濟競賽中遏制了蘇聯模式的擴張；從後一方面看，美國在整個世界經濟中的核心位置，得到美國國內「恰到好處的」、協調一致的增長型政治的加強，它保證了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形態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奠定了新時期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一個以美國的制度和觀念為主導的、以美國模式為向心力的基礎。

上述解釋不一定全面準確，但它們卻有助於理解美國已持續一個世紀之久的世界霸主地位，也有助於說明美國在與蘇聯的全球對抗中立於不敗之地的原因。美國新自由主義的「王道」霸權，使得美國雖然經常遭到世界各國(包括它的西方盟國)這樣那樣的批評，但它的「世界憲兵」和「西方旗手」的地位始終沒有出現替代者。美國在當代的世界霸權有自身的時代進步性，不止是技術、器物層面的先進性，也不光是經濟、政治層面的領先性(如大規模生產方式的不斷創造、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管理方式上的革命)，還包括美國人始終對「科學」力量和方式的執着、對世界事務的關心和「裁判式」強權，包括它所能夠給予世界其他國家、向其他人提供的東西(如先進的大學和科研機構，或如聯合國、GATT、貨幣體系和強大的軍備援助)，以及對所謂「不良國家」的改造或「修理」能力。這中間既有硬的實力及其指數，也有無形的價值輻射與歷史遺產(所謂「硬力量」和「軟力量」)。其他國家即使在某一時期顯示出超越美國的態勢(如70年代前後的蘇聯，80年代左右的日本，以及現在某些輿論家所渲染的「中國威脅論」)，但它們實際上尚不具有美國那種全球性、持續性和全方位的吸引力。從國際政治的意義上講，美國新自由主義的重要性在於把今天的國際關係鎖定在由美國定位的框架內。而美國霸權的前提和基礎，就是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國家／社會結構，一種在二十世紀出現的新資本主義形態。

上述分析同樣有助於我們解釋美國人在西方國際政治學裏長達半個世

新自由主義的「生產性政治」，創造了管理階層對生產過程的有效控制，和勞動者對私人權力下的這種管理方式的不自覺認同。制度化的機構允許甚至鼓勵不同集團、不同社區、不同種族或不同性別基礎上的討價還價，允許分配上的某些鬥爭和磨擦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也存在某種「階級鬥爭」，但它剔除了一般人理解的「階級鬥爭」概念中的政治內容。

從體制和物質層面上講，美國的國際政治學家之所以特別重視科學的作用，行為主義的各種觀念與方法之所以最先在美國得到推廣運用，是與美國的當代科學興盛及它在經濟管理、社會協調、國家權力運作的改良等方面的輻射不可分離的。

紀的中心地位，它是隨着美國的實力地位一道形成的。理論上講，它比後者興起的時間要短，因為思想的傳遞與主導性的形成總是在實踐的發展之後。嚴格地說，美國人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中的巨大作用，是在美國這種新資本主義形態進入成熟期以後才出現的，它的「重心」和權威性為世界其他國家所普遍認可，僅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情。在西方世界，羅斯福的「新政」標誌着第一個將政府的有效干涉與經典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關係的產生；這種新的生產方式及其社會關係使權力政治獲得新的外殼，成為一種建立在「後工業社會」、「無階級衝突」、「信息時代」和「科學管理」等現代性之上的國家機器形態。並非偶然的是，美國的國際政治學最少避諱國際範圍的「階級鬥爭」，恰似美國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在國際事務中表現的那樣；在引導西方世界與蘇聯及其勢力範圍較量的過程中，美國的權力政治學和外交政策學得到最先和最充分的發展。「冷戰政治」是由美國人首先發展出來，並得到最充分、最全面的闡述；而冷戰的最終結局，特別是蘇聯作為另一個超級大國和西方頭號威脅的消失，更使以美國人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國際思潮得到強烈激發和擴散。這是意識形態層面的相關性。從體制和物質層面上講，美國的國際政治學家之所以特別重視科學的作用，行為主義的各種觀念與方法之所以最先在美國得到推廣運用，同樣與美國的當代科學興盛及它在經濟管理、社會協調、國家權力運作的改良等方面的輻射不可分離。美國學者幾乎在社會科學的所有重要領域中推行了與國家發展進程聯

繫在一起的科學化、信息化、計量化的嘗試，並取得了重要的經驗和理論，最明顯的事例是在經濟學、社會學、軍事學、政治學以及國際政治學等領域建立「硬科學」的努力及其成效。像其他一些學科一樣，西方國際政治學的學科化過程是與美國人的努力分不開的——無論是觀點的疏理或者是學派的分流，理論框架的設計或者是研究方法的發掘，認識論的探索或者是本體論的反思。這種超群的實力和巨大的優勢迄今仍未遇到真正的挑戰，西方國際政治學的「美國化」依然是基本特徵之一。

歷史地講，任何強國的演化都有其興衰過程，任何事物也都有其相對性或者局限性。美國也不例外。在筆者看來，以下幾個因素可能會滋生和助長西方國際政治學的多元化過程，儘管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首先是美國社會自身的穩固性的下降。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也被認為是「最好的」）移民國家，也是多民族多種族的「熔爐」（melting pot）。美國的力量和優勢很大程度上在於它能夠吸收世界各種民族和文化的長處，包括人才的聚集和貢獻；美國的國際政治觀的明快有力，表現出美國人的自信，而這種自信不僅來自於國家的整體實力，更在於美國人對自己制度的信心、對國內問題的無憂，或者說對解決問題的有把握。從本世紀以來（尤其是美國成為頭號強國以來），他們似乎就沒有過西歐及其他一些國家那樣的「後顧之憂」：種族對立之憂、國家分裂之憂等等。但是今天的美國也開始暴露此類問題。美國原有的黑人與白人之間的種族問題，由於亞洲和南美洲大量移民所造成的新矛盾，再加上其他一些積累下來的社會問題，可能

使美國陷入嚴重的麻煩之中。有人形象地把這種情形稱為「中心塌陷」^④。如果出現這種情景，可能嚴重削弱美國人在學術上的影響力。

第二是美國式「科學主義」的弱點逐漸顯化。從國際政治研究者的角度觀察，美國的國際政治學既有尊重科學精神、強調科學方法、建立科學規範等優點，同時也存在忽略人文學科的人性特點、忽略社會現象的某些不可丈量性、忽略所謂「模糊性」等問題。其實，人的世界並不是一切東西都有「規律」可循的；當缺少「規律」的時候，美國人善於發現、整理、分析「規律」的專長就可能變成了短處。另一方面，美國的國際政治學研究比較注重外交政策和國家利益的內容，對全球性問題的探討、對「低級政治」的分疏和導引，始終沒有形成前者那樣的專項和優勢（這方面基歐漢和納伊的「相互依存學說」是少有的例外）；相形之下，北歐和西歐的許多學者的專門研究和成果顯得更有特色，因為在後者那裏這是全力以赴從事的工作。

第三是美國以外發達地區新的特長的形成。8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以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某些國際關係研究者，表現出一種明顯有別於「美國化」的趨勢，用英國國際政治理論家斯考特（Jan A. Scholte）的話講，其特點是「從權力政治轉向社會關係」^⑤。如英國「國際社會」學派、法國的「新社會歷史學派」、德國的「社會批判」學派、北歐的「和平研究」學派、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的「多邊主義」學派和「中等強國」專題、廣泛存在於上述國家的「後現代主義」和「新社會運動」的各種流派，等等。如果這一趨勢繼續發展下去，「美國中心」消解的遠景是不難想像的。

第四，非西方世界的崛起。自國際政治學在本世紀前半葉誕生以來，非西方世界在此領域的貢獻不多——不管是研究範式，還是分析方法，包括通用的名詞術語。依筆者管見，在當代歐美國際關係學界，真正得到承認並且有一席之地的非西方國際政治學說或流派，大概只有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毛澤東的游擊戰學說和農村包圍城市理論，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不斷革命思想，南美一些學者在70年代前後首創的「依附理論」，它們無一例外地均處在邊緣的位置。然而，就西方國際政治學日趨多元化的態勢而言，一種可能的遠景是：隨着東亞、南亞或南美以及中東等新興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的崛起，隨着它們在國際政治事務中發言權的加強，隨着它們富有特色的文化和哲學觀念在更大範圍的傳播，國際政治學的「美國色彩」可能逐漸淡化，「東西方」共同創造國際理論、「南北方」同時貢獻研究範式的景象將變得更有可能。但筆者要說的是：第一，它僅僅是一個遠景，而且其間的「文化衝突」斷不會少；第二，即便到了那個時候，各方所佔份量仍然不會一樣。「國際政治」朝「世界政治」的轉換，即從國家間為主體的國際關係向各種行為主體同時發揮重要作用的國際關係的轉換，將是十分漫長的進程。我們對理論層面「非美國化」問題的思索，不應脫開這個參照系統。

就西方國際政治學日趨多元化的態勢而言，一種可能的遠景是：隨着東亞、南亞或南美以及中東等新興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的崛起，隨着它們在國際政治事務中發言權的加強，以及它們富有特色的文化和哲學觀念在更大範圍的傳播，國際政治學的「美國色彩」可能逐漸淡化，「東西方」共同創造國際理論、「南北方」同時貢獻研究範式的景象將變得更有可能。

註釋

④ 例如，韓國、日本和我國台灣省近幾十年來有關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美國化」方向演進的。在這些地方，國際政治學者不

太關心非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相對歐洲學者的工作而言），而比較熟悉美國的學派和範式，並且沿襲了後者的基本框架和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近些年來亦出現了同一趨勢。

② Steve Smith,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tish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Oxford: B. Blackwell, 1985), 20-22.

③ Robert O. Keohane, "Multilateralism: An Agenda for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Autumn 1990): 731-64.

④ 例如，曾經在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作訪問學者、現任美國陸軍學院國家安全事務講座教授的漢迪爾（Michael Handel），專門撰寫了一本《國際體系中的弱小國家》（*Weak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London: F. Cass, 1981, 1990]）的大部頭著作，系統分析了中小國家的概念、它們的力量和弱點的根源，以及它們在不同的國際體系（單極、兩極和多極體系）下的不同角色和功能。

⑤ Steve Smith, "Paradigm Domin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Social Scienc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ate of the Art*, ed. Hugh C. Dyer and Leon Mangasarian (London: Macmillan, 1989), 3-27.

⑥ Pierre M. Gallois, *The Balance of Terror: Strategy for the Nuclear Age*, trans. Richard Howard (Boston: Mifflin, 1961); Thomas C. Schelling and Morton H. Halperin, *Strategy and Arms Control*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1); Donald M. Snow, "Current Nuclear Deterrence Thinking: An Overview and Review",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3, no. 3 (September 1979): 445-86.

⑦⑧ Stanley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ed.

James Der Deria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225; 226-27.

⑨ Kenneth N.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ring/Summer 1990): 21-37.

⑩ Robert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215-20.

⑪ 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⑫ Martin Shefter, "Trade Unions and Political Machines: The Organization and Disorganiz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Ira Katz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199.

⑬ Mark E. Rupert, "Producing Hegemony: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4, no. 4 (December 1990): 450.

⑭ 就筆者所知，「中心塌陷」的說法最先是由李慎之先生在1995年美國所一次有關美國文化與種族問題的研討會上提出來的。

⑮ Jan A. Scholte, "From Power Politics to Social Change: An Alternative Focu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 no.1 (January 1993): 3-21.

王逸舟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著有《當代國際政治析論》、《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